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二)**

**中国航海学会, 泉州市人民政府编**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郭志超

## 泉州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型的变迁

宋元时期阿拉伯、波斯的海商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云集泉州后，泉州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由阿拉伯、波斯人及其后裔组成的侨居族群，并从中部分地转变为与华通婚的定居族群。如果说泉州的这一定居族群在宋代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那么在元代则已形成世代定居的族群即海路回族。元末明初的战乱和民族矛盾促使泉州城区和近郊的回族向远郊和周边诸县农村迁居。其中，居于泉州法石商埠已历二世的一支郭姓回民于明洪武初年迁到后渚港对岸的惠安县白奇开基，至今白奇已形成一万多人的郭氏单姓回族社区。泉州城郊及其周边地区遗存有许多宋元明清的伊斯兰式石墓，对此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进行类型考察和文化分析却被忽略了。笔者曾于1982年暑假回乡，在郭有明老先生的引导下调查白奇回族的墓葬，1983年9月在陈国强导师的指导下在白奇发现延续至现代的隐形的伊斯兰葬式墓，撰写了《白奇回族的墓葬》这部分调查报告<sup>①</sup>，对白奇回族的墓葬作了初步分类的描述。近年又进行补充调查并参照泉州海交馆黄天柱

---

<sup>①</sup> 郭志超：《白奇回族的墓葬》，载陈国强主编：《福建省惠安白奇回族调查报告》，1983年10月油印本。

先生的调查资料<sup>①</sup>进行核对，对若干有差异的数据再行复测。

泉州地区的伊斯兰式墓葬是中古时期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史迹。惠安白奇郭姓回族伊斯兰式墓葬遗迹，包括元代石墓、明代汉式墓围的石墓、明代整石雕成的石墓、明清三合土墓、清代以来的“内回外汉”式墓共五种类型。白奇回墓的形态变迁表现在墓围、墓表石雕纹饰、墓葬构造等方面，是明代以来社会变迁与回汉文化融合的历史反映，内蕴伊斯兰教与回文化变迁同步的这一法则。

## 一 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的分类

以下所考察的泉州市惠安县白奇郭姓回族的伊斯兰式墓，除了现存于今白奇回族乡的地域外，还包括他们未迁居到白奇之前在泉州法石乡的两代祖先之墓。

### 1. 元代伊斯兰式石墓

白奇郭氏由杭迁泉的始祖及其独子皆卒于元，这两代的夫妇并葬墓位于泉州法石乡光堂宫和天堂井的东侧，俗称“柳公砌”或“棋盘穴”墓地。该墓地规模广大，有石砌的四方大平台为基面。台分上、下层，各有两座伊斯兰石墓，上、下层分别是郭德广夫妇双墓和郭子洪夫妇双墓<sup>②</sup>，无汉式墓围，墓碑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十二月重修祖茔而立，并非原葬墓碑，现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郭氏族谱无载郭德广夫妇卒年，仅载郭德

<sup>①</sup> 黄天柱主编：《泉州海外交通史调查资料·惠安白奇专辑》，泉州海交史馆1982年10月油印本，第8~9页。

<sup>②</sup>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戛战乱性质试探》，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第5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广之子郭子洪及其妻卒年。族谱载：“子洪公系德广公之子”，“卒于元至正丙午年（二十六年，1366年）”；“妣孺人翁氏”“卒于明洪武壬子（五年，1372年）”；“合葬附考妣坟，土名棋盘穴”。法石郭氏一、二世墓虽不在白奇，但作为考察一个回民宗族的墓型沿革，必须纳入。元代法石郭氏伊斯兰教式石墓，毁于1956年平整土地。

## 2. 明代汉式墓围的伊斯兰式石墓

这类石墓有开基白奇一世即郭氏回族三世郭仲远（郭德广次孙）夫妇双墓、四世郭仕源墓、五世郭孟俊夫妇双墓、郭孟伟夫妇双墓，共四处。

三世郭仲远夫妇并葬双墓位于白奇龙头山西麓，坐东北朝西南，左墓的墓座长206厘米、宽87厘米、高73厘米，顶石长138厘米；右墓的墓座底长202厘米、宽88厘米、通高70厘米，顶石长135厘米。墓座由下而上逐级收缩，共五级，整石雕成，镂空。由下而上，第一层即底层有六个脚座，雕卷云纹；第二层雕折枝花纹；第三层为素面；第四层雕莲瓣纹，该层表面先呈抛物线而后凹入再扬起，这使得表面的每一下垂的莲花瓣浮雕极富鲜活感；右墓座第五层雕花卉，左墓座第五层镌刻阿拉伯文《古兰经》句“一切均要死亡，唯有真主活着不死”；“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唯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任何东西均要死亡，唯有真主永生不死”<sup>①</sup>。各层雕刻皆阳雕、周刻。石墓的附设建筑，特别是墓围体现了汉式型制。墓区前部为半月形墓井，自墓井而上有石铺三层埕台，石墓即位于第三层埕台。墓围按墓区建筑层次砌以石围墙，底层围墙左右两端各有一卧状石狮，另外两层末端翘脊。墓围后部正中嵌有一方

<sup>①</sup>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58、6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高 70 厘米、宽 40 厘米的石碑，雕刻上下卷云拱圆月浮雕。<sup>①</sup> 墓主郭仲远卒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其妻陈氏卒于明宣德八年（1433）。

四世（二房）郭仕源墓位于里春村东面俗称“鸟树墓”处，坐北朝南，墓座分三层，素面石条砌叠而成，墓顶石前端截面阴刻卷云拱圆月纹，墓座底长 237 厘米、宽 103 厘米、通高 60 厘米。有石砌墓围和墓埕，墓前分立踞状石狮各一尊，墓围正后嵌着精美的鹤、鹿、花草的青石浮雕。墓主郭仕源系郭仲远次子，卒于永乐五年（1407）。附带说一，郭仲远长子即四世（长房）郭仕初及其妻在田岑村西侧的伊斯兰式并葬石墓毁于 1958 年。郭仲远四子即四世（四房）郭仕敏墓不详。郭仲远有五子，形成五房衍派，三、五子“出租”，分别迁居于龙海、诏安。

五世（长房）郭孟俊夫妇并葬双墓在田岑村东面，坐北朝南。墓座由整石雕成，分三层，惟底层横截面阳雕卷云纹，墓座上覆盖墓顶石。左墓座长 201 厘米、宽 77 厘米、通高 52 厘米；右墓座底长 175 厘米、宽 50 厘米、通高 40 厘米。原石砌墓围两侧已毁，墓围两端立有望柱。墓围中部嵌立一石碑于墓桌上，碑的上部雕刻卷云拱圆月纹，竖刻：“郭氏三世祖，乾隆丙寅年吉旦重建。”郭孟俊的后裔对此墓的重建只是重建墓围，原先有无墓围不详。墓主郭孟俊系郭仕初次子，卒于明天顺八年（1464）。其妻黄氏，卒年不详。

五世（长房）郭孟伟夫妇并葬双墓，位于三世郭仲远墓右前侧，俗称“公牵孙”，坐向与郭仲远墓同为坐东北朝西南。两个墓座皆整石雕成，分四层，上覆墓顶石。左墓底长 196 厘米、宽 86 厘米、通高 40 厘米；右墓座底长 192 厘米、宽 82 厘米、通

<sup>①</sup> 参阅黄天柱、林宗鸿：《郭仲远墓及白奇郭姓族属考证》，载惠安文化馆编：《惠安名胜古迹》，第 78 页，1981 年印。

高 40 厘米。筑有石砌墓围。墓主郭孟伟系郭仕初次子，卒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其妻黄氏，卒于成化十年（1474）。

### 3. 明代整石雕成的简易伊斯兰式石墓

“鸟树墓”处有成列的石墓六座，皆坐北朝南。诸墓自西而东依次为：四世郭仕源原配陈氏，五世郭邦永原配曾氏，七世郭绍，六世郭益钦，六世郭益钦继妣李氏，原配王氏。自西而东，头两座墓为一组，同为底长 204 厘米、宽 72 厘米、通高 35 厘米，墓顶脊长 143 厘米；再有两座为一组，同为底长 204 厘米、宽 72 厘米、通高 35 厘米，墓顶脊长 144 厘米；再有两座为一组，西座为底长 265 厘米；宽 108 厘米、通高 45 厘米，墓顶脊长 160 厘米；东座为底长 216 厘米、宽 99 厘米、通高 45 厘米，墓顶脊长 134 厘米。石墓座均为三层，素面，墓顶石截面为半圆形，墓座连同墓顶由整石雕成，实心。无墓围。墓主郭仕源原配陈氏，卒于天顺元年（1457），郭邦永（郭仕源长子）原配曾氏卒于成化年间（1465—1487），郭益钦（郭邦永长子）卒于弘治十年（1504），郭绍（郭益钦长子）卒于嘉靖五年（1526），郭益钦原配王氏、继妣卒年均不详。“鸟树墓”这六座成列墓群连同邻近的郭仕源墓，系白奇郭氏二房郭仕源夫妇及其长媳、长孙、长孙媳（原配和继配）和长曾孙的四代家族墓群。这六座墓的突出特点是将传统的镂空的墓座覆以顶石的构造改为以整石雕成，皆为素面，体积明显较小。

### 4. 明清伊斯兰式三合土墓

该类型墓是三合土仿石墓型制建造的伊斯兰教式墓，有两处，一在下埭村，一在后海村。五世（四房）郭谏评墓在下埭东山仔，以三合土建筑，仿前代的石墓座和墓顶石伏，墓座、顶夯筑一体。墓座为五层，墓座底长 240 厘米、宽 104 厘米、通高

78 厘米，墓顶脊长 112 厘米，三合土墓围已严重破坏和风化。原在离墓不远有一墓道碑，高 130 厘米、宽 50 厘米，碑上阴刻：“大明钦赐捕盗官郭公墓道，岁成化丁未（二十三年，1487 年）仲冬月日立。”墓主郭谏评系三世郭仲远四子之长子，卒于成化二十年（1484）。

十七世（二房）郭淑献及其子的并葬双墓位于后海村西面奎尾山麓，俗称“海潭边”，墓坐南朝北。二墓并列于三合土平台上。这两座三合土墓亦仿传统的石墓座覆顶石状，顶脊截面为弧拱形，皆为底长 230 厘米、宽 83 厘米、通高 38 厘米。墓主为十七世郭淑献与其第三子。郭淑献卒于光绪元年（1875），其子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郭淑献父子双墓前横立阴刻方形阿拉伯文碑，碑前有墓桌。阿文碑刻着穆斯林必诵的“总信言”：“我依照安拉本来的面貌及其所具有的名称和德性信仰他，我接受他的一切律例。”<sup>①</sup> 由于墓地依山坡而筑，墓前横碑还低于墓。有墓围，墓围两端立有望柱。

### 5. 清代、民国和现代的“内回外汉”式墓

根据现存的墓和族谱关于“改从汉制”葬式的记载，从明万历以后白奇回民开始没有采用“坟茔回教法”，直至清康熙末年以后才有部分回民又恢复“坟茔用回教法”。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后对古墓的大量破坏，我们未能全面考察恢复“回教法”的“坟茔”，惟见上述光绪年的伊斯兰教式三合土双墓。然而，至晚从清初以后，白奇回民采用了外观没有上述的伊斯兰式墓型的汉式坟墓，但墓内却是“回坟”。

伊斯兰葬法的“内回外汉”式墓在大山村、贺厝村后的龙头山北麓和山顶，有近百座清代、民国和现代的无棺木的石坟、砖

<sup>①</sup>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 58、60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坟墓。这些石坟、砖坟墓，从外表很难辨认出来。其表面大多是长方形土堆，长满荒草，少数用灰泥抹盖。多数为石坟，用二长二短的石板围成，少数用砖砌成，底部皆见土，上横盖七块石板，俗称“七星板”。1983年，时常参与操办丧事的大山乡75岁老人郭贵美先生介绍了这种“回葬”法：人死后，进行清洗“净身”，男性裸体周身缠白布；女性穿白色内衣裤，套上对襟长衫，脚套白长袜，头戴白色尖顶帽。晚近，部分男性死者也同女性死者穿戴。用三条白布分别扎着胸、腰、小腿部位。下葬时，在底部见土的墓坟底撒上海料，尸体从反复使用的便棺里提起，放入墓坟，用五块红土分别置于死者的头、手、脚部位，盖上“七星板”覆土成堆，或圆形，或长方形，再抹上灰浆。这种丧葬习俗至今仅存于解放前最后一任阿訇生前所在的大山村，且只有极少数的人采用。

有必要说明的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白奇伊斯兰教式墓遭破坏甚多，因此我们对白奇回族伊斯兰教式墓的了解是很不完整的。泉州海交史馆黄天柱先生1978年秋访问白奇后撰写的调查报告指出：“白奇塔仔尾（现五一海堤指挥部所在地）本为白奇村之坟地，相传有很多伊斯兰式石棺墓，因建‘五一海堤’全被挖毁，墓石均被拆去填堤基。”<sup>①</sup>已故的郭有明老先生曾在家藏的《郭氏奇山义房家谱》中沉痛附记：“因第九小队要造厕所，称说土地平整，将一列全房教墓三十八首拆去创造石窟。余不忍祖公遭及此祸，于癸丑年（1972）十月二十五日拾（遗骨）移后山顶，立一圆堆，立一砖牌。”这些“（石）教墓”之毁，造成白奇回族墓葬研究的永远缺憾。

<sup>①</sup> 黄天柱主编：《泉州海外交通史调查资料·惠安白奇专辑》，泉州海交史馆1982年10月油印本，第8~9页。



## 二 白奇伊斯兰式墓形态变迁 及其文化背景

上文描述的白奇回族伊斯兰式石墓有 17 座、伊斯兰式三合土墓有 3 座，时间上至元代，下至清末。在无载明修墓年代的情况下，笔者权将墓主的卒年作为修墓年。所述的元代伊斯兰式石墓惟其中的二世郭子洪之妻的墓修于明洪武五年（1372），由于墓已毁，按夫妻并葬双墓的通制，郭子洪妻墓与卒于元代的夫墓的型制当同，且郭子洪妻墓从属元代郭氏一、二世完整的墓群，故归入元代石墓。明代有汉式墓围的伊斯兰式石墓的上下限是永乐二十年至成化十六年（1422—1480）；明代简易的伊斯兰教石墓上下限是天顺一年至嘉靖五年（1457—1526）；明清伊斯兰式三合土墓上下限是成化二十三年到光绪十一年（1487—1885）。无汉式墓围的石墓、有汉式墓围的石墓、整石雕成的简易石墓、三合土墓，大抵组成了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型的一个逐渐退化的系列。当然，各种型制的伊斯兰式墓在时间上不是绝对前后衔接，而是有部分重叠的。清代、民国和现代的伊斯兰葬法“内回外汉”式墓，是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嬗变的最后结果，故也列入考察范围。

### 1. 白奇伊斯兰式墓形态的变迁

白奇回族伊斯兰式石墓在明代发生了三个突出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出现了汉式墓围。永乐年间三世郭仲远墓首次出现了汉式墓围，但仍包含伊斯兰文化的特质，那就是墓围后部正中嵌有上下卷云拱圆月浮雕，这是伊斯兰教的一种象征。宋元时期泉州的伊斯兰式石墓的顶石前端截面多见卷云拱圆月（个别为上弦月）浮雕，郭仲远夫妇双墓则将传统的刻于墓顶石前端截面的卷

云拱月浮雕分解性地移置于墓围后部正中嵌石。直至五世郭孟俊夫妇双墓的清乾隆重修的墓围后部正中的嵌碑上部也有卷云拱圆月浮雕，这与三世郭仲远夫妇双墓类同。郭仕源墓除了其墓顶石前端截面阴刻卷云拱圆月浮雕，这与三世郭仲远夫妇双墓类同。郭仕源墓除了其墓顶石前端截面阴刻卷云拱月纹外，全为素面，对墓的雕饰兴趣转移到汉式墓围；所嵌的青石有精美的鹤、鹿、花草浮雕，墓前分立一尊石狮。位于“鸟树墓”的六座石墓没有汉式墓围，这些先后修建而组成的四大家族墓群象征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并大抵体现了墓的位际涉及到家族内部的横向和纵向关系，另外也说明了明代永乐年间出现的汉式墓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白奇回民的意识中并非根深蒂固。

第二个变化是石墓表面雕饰的变化。三世郭仲远夫妇双墓分五个层级，逐级收缩，底层雕卷云纹，第二层雕折枝花纹，第三层为素面，第四层雕莲瓣纹，右墓（妻墓）第五层雕花卉，左墓（夫墓）第五层刻阿拉伯文《古兰经》句，各层雕刻皆阳雕、周刻，顶石素面。这与常见的宋元泉州伊斯兰式石墓型制和雕饰没有任何差别。宋元泉州伊斯兰式墓一般分为三至五个层级，底座（底层）通常是卷云纹，上一层是莲花瓣纹，再上一层是阿拉伯文《古兰经》句，各层皆周刻。如果不止三层，那么其他层面则雕花卉纹或只是素面。纹饰皆阳雕，文字多阳刻，少数为阴刻。卷云纹可能象征死者升天归真，莲花瓣纹应象征伊斯兰教的清净之意。三世郭仲远夫妇双墓的墓表雕饰至其后代墓很快就几乎全消失了，惟有四世郭仕源墓的顶石前截面阴刻卷云拱圆月纹，以及五世郭孟俊夫妇双墓的墓座阳雕有卷云纹，除此之外，再没有见到墓表有雕饰的了。四世郭仕源墓顶石前端截面阴刻卷云拱月纹，在白奇这是首次出现，看不出与此前当地的继承关系。其继承关系可上溯到宋元泉州的伊斯兰教式墓的顶石前端多见卷云拱圆月浮雕的这一传统特质。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年间的郭淑献父

子双墓前的墓桌后横碑镌刻穆斯林“总信言”，是宋元时期泉州伊斯兰石墓和墓碑镌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句这个传统的流风。这种形态在白奇很孤立，考虑到郭淑猷是虔诚的穆斯林，其先辈曾担任过白奇埭上村清真寺的阿訇，这种碑铭形态可能是通过宗教联系渠道，借鉴早期泉州伊斯兰式墓的碑铭遗存和受墓前立碑的汉墓形态的影响，加以适当变新而产生的。

第三个变化是墓座、墓顶构造的变化。三世郭仲远夫妻双墓的墓座是整石雕成，镂空，上覆墓顶石，墓顶石截面是三弧拱形。宋元泉州伊斯兰式石墓的墓座多是整石雕成，多数镂空，少数实心，上覆墓顶石，顶石截面或是尖拱形，或是三弧拱形，或是单弧拱形。三世郭仲远夫妇双墓承袭了宋元泉州伊斯兰石墓的构造，五世郭孟俊夫妇双墓、五世郭孟伟夫妇双墓也是如此。然而，四世郭仕源石墓的墓座却是由条石围砌而成，“乌树墓”的四世至七世的石墓群的墓座连同墓顶由整石雕成，当然更不可能镂空了。至于石墓通高差不多比郭仲远夫妇双墓矮了半截，是由于体积较小便于整石雕成。此外，墓的质料也出现变化，五世郭谏评墓改用三合土夯成，用三合土建造可能是受汉族的影响，也可能借鉴当时尚遗存于泉州的伊斯兰式三合土墓，这种三合土墓在清代光绪时又有出现。

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渊源于宋元泉州伊斯兰式墓。泉州已发现近百方宋元时期伊斯兰墓碑，此处墓碑是前置（贴）于三合土夯成的拱状长形墓前，较之泉州已发现的数以百计的伊斯兰式石墓，它应是泉州伊斯兰式墓的早期形态。借助于宋代泉州高度发达的石雕工艺和当地丰富的石材，这种石碑土墓发展为石墓这种成熟形态，石墓的层次和雕饰演变到相当繁复的程度。宋元时期泉州伊斯兰式墓正是循着质料由土到石、雕饰由简到繁这一进化程序。白奇明代早期的郭仲远夫妇双墓正是元代泉州高度成熟状态的伊斯兰式石墓的延续。当郭姓回民迁居惠安县的一隅海角，

离开了原来泉州城内外伊斯兰文化及其与汉文化融合而成的回文化这一大环境，独支进入汉文化的间隙生存后，必然就开始了日渐加剧的汉化进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回文化必日渐凋敝，其伊斯兰式墓也必日渐退化。宋元时期泉州伊斯兰式墓的一系列特质是循着由简到繁的逻辑而结构的，而明初以后白奇回族的伊斯兰式墓原有的一系列特质则是循着由繁到简的逻辑而解构的。解构过程中出现的诸形态当然不可能是结构过程中出现的诸形态的逆向呈现，因为至少是解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文化变动和介入的汉文化因素使之发生了种种变异。

## 2. 白奇伊斯兰式墓变迁的文化背景

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自明万历以后出现了历史断流，如何解释这一变动呢？白奇《郭氏族谱》把伊斯兰式墓葬称为“坟茔用回教法”（《适回辨》）和“教法墓”（《载修茸义斋郭公墓文》），因此考察白奇回族伊斯兰墓葬的变迁必须考察白奇回族伊斯兰教的变迁。《郭氏奇山义房家谱》中的《复遵回回教序》载：“我祖自开基白奇以来，曾贮天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郭氏族谱》中有郭肇汾于嘉庆十二年写的《适回辨》，文中说：“（白奇郭）先人之适回，……传至八世、九世乃出教，谅在明万历年间。”在《郭氏族谱》的《四房本支世系·莲塘公行状》说：“自元朝德广公即广教，相传曰吾宗至八世、九世乃出教。及第十世宏隆公……念先人从清真教……康熙己丑年间陈都督讳有功仕于泉，重兴清真教，故宏隆公复入教。”《郭氏族谱》在记述“宏隆公”事迹时又载：“康熙己丑年（四十八年，1709年）间，陈都督讳有功仁于泉中协参府，重兴教门。百奇叔侄来城贸易，复入教多矣。埭上礼拜寺系陈公建造焉。”这些记载表明白奇回民从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末年放弃伊斯兰教，直到康熙末年以后，在泉州“重兴教门”的推动下，才又恢复伊斯兰教。

可见，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在万历以后的历史中断与万历年间郭姓回民“出教”有关。

那么，是什么变故造成白奇郭姓回民在万历年间放弃伊斯兰教呢？明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倭患于嘉靖为炽。据与白奇郭姓回族同处于泉州湾畔的晋江县陈埭丁姓回族的族谱<sup>①</sup>记载，“嘉靖癸未岁（二年，1523年）……倭乱炽”（《仁庵府君像赞·附文》）；嘉靖十年（1531），“岛夷乱，举宗旅散，失亡者多”（《族谱记略引》）；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据其地（陈埭）”，“举族室庐荡然俱毁，无有存者”（《宗聚说》）。据陈埭丁氏族谱记载，嘉靖年间，陈埭回风开始骤变，丁姓穆斯林原有的“诵清经，仿所传夷音”的情景，从此烟消云散。<sup>②</sup>白奇《郭氏奇山义房家谱》中有十二世郭梦祥写的《复遵回回教序》，文中说：“我祖自开墓百奇以来，曾贮天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孰意传及五世后（此文以开基白奇的郭仲远为一世祖，本文所引的《郭氏族谱》皆以开基泉州法石的郭德广为一世祖，依此，这里的“五世”应为“七世”），遭兵燹之间关，掌教失传，遂迷染外教之风，竟蒙昧正教之则。”这里所说的造成“掌教失传”的“兵燹”应就是嘉靖时的“倭乱”。当然，嘉靖的“倭乱”并不是白奇回族伊斯兰教丧失的根本原因，而只是直接导因。郭姓回民迁到白奇以后，伊斯兰教就逐渐式微。早在明永乐时，开基白奇的郭仲远就有这种隐忧，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地立下家训：“无辍世从回教清真。”（《郭氏族谱·毅轩仲远郭公家训》）然而，白奇回族伊斯兰教式微的必然趋势已成定局。白奇

<sup>①</sup> 泉州历史研究会编：《泉州回族谱牒资料汇编》（陈埭丁姓回族部分），1980年油印本。

<sup>②</sup> 郭志超：《陈埭丁与白奇郭汉化的比较研究》，载陈国强主编：《陈埭回族史研究》，第304~3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社区惟郭姓一支回民，犹如处于汉文化大海的文化孤岛，其汉化之势是不可逆转的。

泉州伊斯兰教的重兴和白奇清真寺的重建吸引了部分回民入教，入教的回民以重兴白奇伊斯兰教的郭姓领头人郭宏隆所属的郭氏四房族人为多。伊斯兰教的重兴使“用棺木葬法”的“汉制”（《郭氏族谱·莲塘公行状》）受到了局部的遏制，白奇的穆斯林又恢复了传统的葬式，甚至有的穆斯林还把先代的汉葬改为回葬。《郭氏族谱·九世慕程公（附文）》提到郭宏隆将其父“慕程公”“葬在棺木，改为回葬，于今尚是骸坟之象，后之子孙巡墓，不可不知之”。由此可知，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后白奇回民恢复“回葬”有两种形式：一是外观是类同早年的伊斯兰式石墓或三合灰墓，一是上引的“回葬”而外观“尚是骸坟之象”的墓葬，这也就是上文所描述的清代以来伊斯兰葬法的“内回外汉”的坟墓。不用棺木，墓圪底部不允许有砖、石等物，而是直接见土，这是世界各地穆斯林葬式的基本特点。当然，新入教的穆斯林只是白奇回民中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清康熙末年以后，墓型外观是汉式与伊斯兰式，以及外观同为汉式墓型而葬式分为“汉葬”与“回葬”，这些在白奇都是并存的。这两类中，前者的数量肯定都比后者多。

白奇回墓的变化是明代以来东南社会变迁与回汉文化融合的历史反映。白奇回墓的变化所呈现的是其秉承的宋元时期泉州伊斯兰式墓型特质的逐步消解。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型以及所涉及的葬式的变迁是其文化变迁的突出表现，这种变迁显示与伊斯兰教变迁的同步关系。回文化与伊斯兰教变迁的同步关系，是回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法则。伊斯兰教是回文化的核心并起制约和诠释功能，在回文化的变迁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奇怪的是，在回族研究的著述中，常有“回族文化与伊斯兰教无必然联系”的谈论。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不是基于思辨而是建立在事实分析的基

基础上,不知持“无必然联系”的论者能否找出一例来说明伊斯兰教衰落了而回文化并不凋敝?本文对白奇回族墓型以及葬式的变迁所揭示的回文化变迁法则,是值得引起学术界重视的。